

新剧苑

岭南戏剧源流编

谢彬筹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岭南戏剧源流编

谢彬筹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南戏剧源流编/谢彬筹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 3
(新剧苑)
ISBN 978-7-104-02942-7

I. 岭… II. 谢… III. 戏剧史—研究—广东省 IV.
J8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520 号

岭南戏剧源流编

责任编辑:刘建芳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0

字 数:1800 千

版 次: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942-7

定 价:200 元(全八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广东戏曲源流综述

(代序)

广东省位于中国的南部，简称粤。古代是“百越”族聚居的地方之一。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岭南设置桂林、象、南海三个郡，今广东省境大部分属南海郡。“汉承秦制”，岭南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个郡。西汉末，将儋耳、珠崖并入合浦郡。东吴统治时期，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广州统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等郡，广州的州治设在番禺，广州由此得名。唐初设岭南道。后把岭南道划分为岭东道与岭西道，东道治所在广州。宋初在岭南设置广南路，宋太宗晚年把广南路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东之名自此始。元朝在今广东省境内分设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广东道属江西行省管辖，海北海南道属湖广行省管辖。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朝政府改广东道为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并将海北海南道改隶广东，广东成为明朝十三行省之一，后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明代广东承宣布政使司辖广州府、韶州府、南雄府、肇庆府、惠州府、潮州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琼州府和罗定州，分辖七十五个县。嘉靖三十二年

(公元1553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借口曝晒水浸货物，强行在原属香山县（今珠海）的澳门登岸。清朝置广东省，全省划分为广州府、韶州府、肇庆府、惠州府、潮州府、高州府、雷州府、琼州府、廉州府和崖州、罗定州、嘉应州、南雄州、连州、连山厅、佛冈厅、赤溪厅、南澳厅、阳江厅，分辖七十七个县。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先侵占了香港岛，又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侵占九龙半岛。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和好通商条约》，公然霸占澳门。光绪二十四年，英帝国主义强行租借新界。同年，法国也强迫清朝政府同意租借广州湾。广州湾即今湛江。1943年被日本占领，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我国收回，改置湛江市。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广东省的范围与清朝相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82年广东省直辖广州、海口、汕头、湛江、茂名、佛山、江门、韶关、深圳、珠海十个市，分设佛山、韶关、惠阳、汕头、梅县、肇庆、湛江七个地区和海南行政区及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共辖九十五个县（内有三个民族自治县）。

广东省东邻福建，西接广西，北靠湖南、江西，南临南海。境内东、西、北三条江汇合为珠江，形成珠江三角洲平原；东部韩江流域有潮汕平原；西部、北部和东北部是丘陵和山地；西南面是海南岛。土地面积二十二万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长达四千三百多公里。气候温暖，雨量充沛，三冬无雪，四时常花，稻薯三熟，蚕丝七收，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优越，物产丰富。

广东省古代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秦始皇统一岭南开

始戍兵，强制许多“谪徙民”迁到岭南“与越杂处”。“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托处，熏染过化，岁异而月不同，世变风移，久假而客反为主。”（咸丰七年刻《琼山县志》录丘浚《南溟奇甸赋》）广东逐渐成为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现今有汉、黎、苗、瑶、壮、回、满、畲等民族。多民族的共同奋斗，创造发展了广东的经济和文化。

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广东很早就种植水稻和经济作物，在农业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农业商品性生产得到发展。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广东具有发挥对内、对外贸易的优势。汉代以来，番禺、徐闻便是我国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还有郴宜古道和梅岭古道沟通南北的交往。东吴至南朝，番禺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卷三十二）。唐代在广州设置管理外贸的官员市舶司，频繁的对外贸易给广州带来经济的繁荣。宋代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宋《太平御览》卷七六九）。诗人刘克庄吟咏当时的广州说：“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宋诗钞·后村诗钞》录《即事四首》之三）商船涉海远航到琼州贸易，出现“千帆不隔云中树，万货来从徼外舟”（宋李光《阜通阁》）的盛况。明代潮州“舶通瓯吴及诸蕃国……以故殷甲邻郡”（《永乐大典·潮州府》）。粤北为“交广咽喉”，贸易运输极频繁，并且兴起了采矿业。

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中原文化不断传

入，广东省的歌舞娱乐盛行。唐代开元中，李仙鹤擅演参军戏，“明皇特授韶州同政参军，以食其禄”（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南海郡官宦之家蓄有家班“散乐”，“盛饰声伎”。唐末，连州人陈用拙著《大唐正声新徵琴谱》十卷。宋代之前，“有善歌者与其夫自北而至”南中某大帅府，“更唱迭和，曲有余态”（《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宋代“开宝中平岭表，择广州内臣之聪警者得八十人，令于教坊习乐艺，赐名箫韶部，雍熙初改曰云韶部”（《文献通考》）。吸收了中原文化，广东各地的文化娱乐日渐活跃。操粤语的粤中、粤西地区，民俗喜好讴歌乐艺。广州、韶关出土的晋代砖文，有“永嘉世、九州荒（凶），余广州、皆平康（丰）”的歌谣和舞蹈图像，张买于汉惠帝时，“侍游苑池，鼓棹能为越讴。”（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四）明洪武三年，曾任工部织染局使的孙蕡被捕入狱时，“望都门讴吟为粤声”（《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四）。到了清代，民间广泛传唱木鱼歌，所以王士禛的《广州竹枝词》说：“两岸画栏红照水，昼船争唱木鱼歌。”（《渔洋诗集》）木鱼歌可长可短，“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昌官词、琵琶行等，至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其短调蹋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比喻，多如子夜、竹枝”（康熙三十九年刻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迎神赛会更为常见，如位于广州城北的楼船将军庙，“岁为神会，作鱼龙百戏，共相睹戏，箫鼓管弦之声达昼夜，其相沿由来旧矣”（清同治九年修《广州府志》卷一百六十）。粤北和岭东的客家方言区，流行山歌竹板歌，前人谓之“牧人与樵子，唱彻百蛮天”（康熙五年刻《乐昌县志》之“前贤遗址”）。唐元和年间，刘禹

锡在连州作《插田歌》也说：农人“齐唱田中歌，嚶佇如竹枝”（《全唐诗》卷三百五十四）。粤东和雷州、琼州同属闽南方言语系地区，习俗大同小异，喜吟唱游乐。潮州府“也好酣歌，新声度曲，灯宵月夜，傅粉嬉游”（蓝鼎元《鹿洲初集》卷十四《潮州风俗考》）。琼州府于新春佳节“装僧道、狮鹤、鲍老等剧，又装番鬼舞象，编竹为格，衣布为皮，或皂或白，腹闷贮人，以行代舞”（明《正德琼台志》卷七）。

诸多民间娱乐品种和活动形式，为广东戏曲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明代广东的戏曲活动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派兵进军广东，一路由福建海道取潮州，一路由赣州陆路克韶州、德庆，两路会师进入广州，广东很快归顺明朝统治。随后明王朝在广东建置卫所，军队实行耕战结合；采取租佃制、赋役折银与一条鞭法等，促进粮食产量增长和农业商品性生产发展。手工业生产随之也得到发展，城市商业进一步繁荣，贡舶贸易与商舶贸易兴旺。宣德以来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广州成为国内重要的贸易城市，广东出产的铁器、陶瓷、糖、盐、果品及国外进口的香椒、苏木、宝石等商品，行销国内许多城市。外省的粮、棉、茶、铜、锡、木材等货物，也大量进入广东。洪武三年，明朝政府设广州市舶司，“通占城（今越南南部）、暹罗（今泰国）、西洋诸国”，并在广州设怀远驿，招待外国贡使和“蕃商”居住。常至广东的有十二国，多时达十五国。“诸蕃利中

国货物，益互市通商，往来不绝”（印鸾章《明鉴》卷三）。城市商业繁荣，歌舞娱乐随之增多。明初的孙蕡在《广州歌》中对广州的繁华景象作了这样的描述：“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嵒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乾隆二十四年刻《广州府志》之《艺文》）由明入清的屈大均（公元1630年—1696年）记叙广州城外西角楼这个游乐的处所：“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鳞次而家。”（康熙三十九年刻《广东新语》卷十七）省外戏曲随着官宦、军旅、客商等的往来，陆续经由水、陆两路传来广东。

地下的戏曲文物陆续出土，揭开了广东戏曲早期的历史。1975年从潮安县的明初墓葬中，出土了宣德年间写本《刘希必金钗记》，剧终处写有“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卷终下，宣德七年六月日在胜寺梨园置立”等字样，写本第五页第四出上还写有“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宣德”这个年代非常明确。写本附有锣鼓谱和朱笔圈点的演唱处理记号。

景泰至弘治年间在朝参与机务、籍隶琼山县的丘浚，曾经撰写《伍伦全备记》等五部传奇作品。

明代成化年间，广东民间好尚戏曲，引起官绅的不满而屡申严禁。成化十五年至二十二年（公元1479年—1486年）任新会知县的丁积，因“乡俗子弟多不守常业，惟事戏剧度日”，通谕“勿事戏剧，违者乡老纠之”；并责令“用鼓吹杂剧送殓者罪之”（康熙二十九年刻《新会县志》卷八）。成化十七年写的石湾《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卷三之《太原霍氏仲房世祖晚节翁家箴》谓：“七月之演

戏，良家子弟，不宜学习其事，虽学会唱曲，与人观看，便是小辈之流，失于大体，一入散诞，必淫荡其性。后之子孙，遵吾墨囑。”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揭阳县进士薛侃立《乡约》：“家中又不得搬演乡谭杂戏，荡情败俗，莫此为甚，俱宜痛革。”（清乾隆四十四年修《揭阳县志》卷七）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魏校于正德十六年发布《谕民文》说：“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社学”；“不许造唱淫曲，搬演历代帝王，讪谤古今，违者拿问”（明归有光编次《庄渠遗书》卷九）。尽管官吏豪绅严申禁令，而城镇乡村演戏蔚然成风，并且相沿成俗。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刻《广东通志》卷二十《民物志·风俗》记述了各地情况：广州府“二月城市中多演戏为乐，谚云‘正灯二戏’”，并有“搬戏难成器，弹弦不是贤”的俗语，所以“江浙戏子至，必自谓村野，辄谢绝之”。潮州府“习尚大都奢僭，务为观美，好为淫戏女乐”。琼州府“迎春，府卫官盛服至于东郊迎春馆，武弁各竞办杂剧故事”。韶州府、惠州府、雷州府等也都有“妆饰杂剧”、“装办杂戏”、“妆鬼搬戏”的习俗。

明代中叶以后，广东各地有南戏、北曲、潮调、弋腔、昆腔诸种声腔流行。1958年在揭阳县明代墓葬中发现题名《蔡伯皆》的两个写本，有全剧总纲本和小生使用的己本，其中一本有“嘉靖”年号题记。《蔡伯皆》和前述《刘希必金钗记》两个写本，同宋元南戏的《蔡伯喈琵琶记》和《刘文龙菱花镜》基本相同，但已增加了一些宾白，戏文杂有潮州俗字方言，说明潮州民间艺人在演出时已根据当地条件有所发展。徐渭于嘉靖三十八年写成的《南词叙录》记述：“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

京、湖南、闽、广用之。”弋阳腔对广东一些剧种的形成产生过影响。粤剧现在还保留有腔调高亢激越的“大腔”剧目，邻省湘、闽把弋阳腔（高腔）亦称为“大腔戏”、“大汉腔”，粤剧唱腔音乐有弋阳腔的东西。有人认为正字戏、潮音戏、白字戏的唱腔音乐有帮腔和大锣大鼓，是弋阳腔遗响。此外，粤东地区有嘉靖四十五年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附刻《颜臣》）、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和相传亦刻于万历年间的《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共三种五个剧本传世。五个剧本除《颜臣》外，其他都是取材于潮州民间故事而编成长达几十出的戏文；几个刻本的题名分别写有“五色潮泉”、“乡谈”、“潮调”等字样，《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还署明是“潮州东月李氏編集”。万历年间，北曲仍在广东流行，昆曲也传播入粤。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二之《序黛玉轩新刻（北雅）》一文，记述博罗人张萱（字孟奇）家有姬人，善习《太和正音谱》，“而以一女子饶为之，不数月而两手与器相习，其颖慧有过人者”。姬人死后，张萱为了悼念她，以黛玉轩之名补刻《太和正音谱》，并易名《北雅》。张萱还撰有杂剧《苏子瞻春梦记》。冯梦祯在同书卷五十九又记述，万历三十年九月，“吴徽州班演《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技也”。“吴伎以吴徽州班为上，班中又以旦张三为上”。所述吴徽州班是徽州人办的唱昆腔的戏班，张三是从广东回去的唱昆腔的有名演员，可知当时昆曲在广东已传唱颇广。与此同时，曾任南京国子监丞的番禺人韩上桂（字孟郁），撰作剧本《凌云记》，因为女优傅灵修演唱了其中的《文君取酒》一

折，便赏她以百金。万历四十三年至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间，有张乔号二乔，美而工诗，“母吴倡也，以能歌转卖入粤，生丽人”。张二乔曾“随诸优于村圩赛神为戏”，声艺倾倒广东士大夫，死后有百多人送葬，还为她在广州白云山麓梅坳修了花冢。“张诞二乔之名，虽城市乡落，童叟男女，无不艳称之，以得观其歌舞为胜”（乾隆三十年重刻《莲香集》之黎遂球《歌者张丽人墓志铭》）。昆曲对广东的许多剧种都有较大的影响，粤剧、潮剧、广东汉剧、正字戏等的唱腔音乐中，都有昆曲的遗响，有的还保留演唱昆曲的剧目。

清代广东的戏曲活动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帝福临迁都北京后，分兵平定各地。顺治九年清军攻下琼州府，广东全境才告平定。在这九年之中，清军先是对抗清义军、李定国农民军和南明政权进行攻剿；其后，清王朝为了制驭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的反抗斗争，厉行“禁海”和勒令沿海居民两次“迁界”的措施；后来又平定藩王尚之信的叛乱，广东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康熙帝采取了奖励农业生产、实行“摊丁入地”等措施后，广东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清政府宣布“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后又在广州指定商人设贸易商行（俗称十三行），经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广州及省内一些城市的商业很快繁荣起来。那时在广州，“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康熙三十九年刻《广东新语》卷十

五)城南濠畔街是“天下商贾聚焉”的闹市区,“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康熙三十九年刻《广东新语》卷十七)。许多外国商人流寓其间,“往往乐而忘返”。商业繁荣,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戏曲的兴盛。广东各地出现关于泉潮雅调、高腔和广腔的史料记载,粤中地区的戏班艺人还成立了琼花会馆这个行会组织。

顺治八年,粤东的潮州刻印了《新刊时兴泉潮雅调陈伯卿荔枝记太全》。从明代的潮腔、潮调到此时的泉潮雅调,不但唱腔音乐有所丰富,并有管弦、马锣等乐器伴奏。康熙年间的潮州画家陈琼所作《修堤图》之“演戏庆功”局部,描绘了潮州露天演戏和民间看戏情景:六柱的戏棚上挂竹帘为幕,乐工分坐两旁,演员正在更衣化妆;戏台之下万头攒动,顽儿攀沿台柱及前台观看。形象地表现了“梨园婆娑,无日无之”的生动情景。据英国人布赛尔所著《东南亚的中国人》卷三《在暹罗的中国人》叙述,1685年和1686年(康熙二十四、二十五年),有广东和福建的演员在暹罗皇宫为欢迎法王路易十四的使节而举行的盛宴上演戏助兴(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一期)。

广州和粤中地区自顺治年间以后,戏曲活动日益频繁。戏曲活动中心之一的佛山镇,于顺治十五年在灵应祠前建戏台时立《华封台会碑》注明:“本会台上演戏鼓桌什物俱全。”康熙四十四年八月初二日,番禺县芳村谢氏家族“入主登台庆贺”,“连演三天京戏”(1936年修《番禺芳村谢氏族谱》的谢氏后人,把当时的“京腔”记为“京戏”)。乾隆年间李调元著《雨村剧话》称:弋腔“即

今高腔”，“京谓京腔，粤俗谓之高腔”。可知高腔此时也在广东民间传演。这时广州、佛山等地人民看戏之风甚盛，“各处近圩之横水渡，每遇圩期以及演戏，俱多赶快，争先下渡，致重沉亡，在在皆然，岁岁俱有”（《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卷三录康熙五十九年所写《商有百物之当货》）。康熙年间，曲江县人廖燕撰作《醉画图》等四种杂剧，均以自己的经历为题材，抒发其对世道不平的怨忿。在《醉画图》中，更以自己作为剧中的主要人物，对着二十七松堂（廖的书斋名称）墙壁所挂的四幅人物画而自思自叹，并与画中人物进行交谈，在杂剧创作中是别开生面的创造。

雍正年间，广州地区有“土优”、“土班”及其所唱的“广腔”的记载。苏州人绿天先生所作《粤游纪程》（雍正十一年松陵李元龙作序）中《土优》一篇有以下记述：“广州府题扇桥为梨园之藪，女优尤众，歌价倍于男优。桂林有独秀班，为元藩台所品题，以独秀峰得名，能昆腔苏白，与吴优相若。此外俱属广腔，一唱众和，蛮音杂陈。凡演一出，必闹锣鼓良久，再为登场。……榴月朔，署中演戏，为郁林土班，不广不昆，殊不耐听。探其曲本，只有《白兔记》、《西厢记》、《十五贯》，余俱不知是何故事也。内一优，乃吾苏之金阊也，来粤二十余年矣，犹能操吴音，颇动故乡之恻。”这种“广腔”是在弋阳腔、昆腔和高腔的基础上形成的广东地方声腔。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新会县知县王植在文稿述及新会县演戏的热闹景象：“演戏一事，耗财为甚，而锣鼓之声，无日不闻，冲僻之巷，无地不有”；诚责“财物竭于优倡”的“养戏之家”，勿为“男优女倡之领袖”（《崇德堂稿》卷八）。又

说：“余在新会，每公事稍暇，即闻锣鼓喧阗，问知城外河下，日有戏船，即出示严禁。”（《牧令书辑要》卷六）由于俗尚戏曲，戏班日益增多，在佛山镇成立了“伶人报赛之所”的琼花会馆。“会馆演剧，在在皆然；演剧而千百人聚观，亦时时皆然。”（乾隆十九年刻《佛山忠义乡志》卷五）

从乾隆至道光的百余年间，广东社会比较安定，商业更趋繁荣，经济出现新的发展高潮。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仅留广州一个口岸对外通商，广州的商业十分繁忙，佛山、潮州、江门、海口等地的手工业、商贸、海运也相当发达。广州帮商人“或奔走燕齐，或往来吴越，或入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殖其中。”（嘉庆《龙山乡志》卷四）潮州帮商人“康、雍时服贾极远，止及苏、松、乍、浦、汀、赣、广、惠之间”。到嘉、道年间，“则海帮遍历，而新加坡、暹罗尤多列肆而居”（光绪《海阳县志》卷七）。到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分别来自英、法、荷兰、丹麦、瑞典、普鲁士等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蚕丝、丝织品、茶叶、瓷器、药材、土布等。进口的外国商品有呢绒、棉布、钟表、大米等。就合法贸易而言，中国处于对外贸易出超的地位，大量外银由印度和欧美流入中国。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发达，山陕、江浙、福建、安徽、江西、河南、湖广等地的商人，大量进入广州、佛山各处投资经营工商业，并纷纷建立各自的会馆。商业资本和商品流通的发达，促进了信用制度的发展。广州产生了银业公会忠信堂，全盛时拥有会员三十四家。山西票庄在广州亦设有分店。外省商帮荟萃，贾客云集，戏曲演出为满足商客的娱乐要求而更加兴

旺。乾隆年间有外省的成百个戏班来广东演出，这些戏班统称外江班。乾隆二十四年，外江班在广州建立行会组织——粤省外江梨园会馆，与早在乾隆初年由本地班在佛山建立的琼花会馆各树一帜。

粤省外江梨园会馆遗留乾隆二十七年至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的碑记十二块，这些碑记反映了一百二十年间外省戏班在广东争妍斗丽的景象。乾隆二十七年所立《建造会馆碑记》是最早一块碑记，勒石刻记“沐恩江西章贡弟子钟先廷捐银五百六十八两四钱创建”，还记有捐银的十五个未注明省籍的外省来粤戏班。乾隆三十一年立的佚名碑记，勒石的五个戏班中，洋行班和姑苏红雪班是唱昆曲的。乾隆四十五年立《外江梨园会馆碑记》，勒石戏班十五班，其中有安徽班八班、江西班两班、湖南班一班、未明省籍的四班。乾隆五十六年立《重修梨园会馆碑记》，勒石戏班十七班。同年立《梨园会馆上会碑记》勒石戏班四十七班，去其重复者，共有来粤外省戏班五十二班。其中有湖南班二十一班、姑苏班十三班、安徽班七班、江西班四班，还有未明省籍的戏班七班。从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六年这十一年间，湖南班由一班增至二十一班，姑苏班也增加到十三班，但江西贵华班勒石记名从乾隆四十五年至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长达五十七年之久，江西弟子又是会馆的创建者，可知江西戏班对广东戏曲的影响甚为长远。安徽班在广东一度居于上风，广东一些剧种曾受到徽班很大的影响。乾隆四十五年来粤徽班多达八班，共二百六十二人。因为其时皖茶运粤占优势，安徽商人来得很多，又值徽班极盛时期。八班之中有由汪飞云等组成的安徽春台班，在广东活动的时间很长，乾隆

五十六年、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的碑记仍刻有春台班的名字。《扬州画舫录》记载春台班曾聘粤籍名伶刘八入班，刘八以小丑技艺享誉艺坛。雍、乾以后，姑苏班在广东剧坛占有相当主要的地位。随着广东各地的江浙会馆日益增多，姑苏班相继接江浙商帮之踵而至，许多姑苏班是唱昆曲的，一些徽班也唱昆曲。乾隆五十六年来粤的湖南班共二十一班，占了来粤外江班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原因在于“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交通皆以陆，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容闳《西学东渐记》第九章）众多的湖南班中，以衡阳戏班和祁阳戏班居多，他们演唱高、昆、弹各种声腔。湖南班不但来粤者众，戏班生意也兴旺，湖南衡州府衡阳县单正礼于嘉庆十年发起重修会馆，个人“助银一百两补足”，同年重修会馆各殿，又以天福班、瑞麟班的名义各捐银五十两。在未标明省籍的戏班之中，据考太和班是陕西班，豫鸣班是河南班。粤省外江梨园会馆碑记所反映的戏曲活动情况，从一个方面说明乾隆四十六年江西巡抚郝硕复奏查办戏曲的情况属实，即“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史料旬刊》二十一期）。乾隆四十五年所立《外江梨园会馆碑记》记录的公议条规之一是：“来粤新班俱要上会入公，如有充官班不上会，官戏任唱，民戏不准。”可知除参加会馆的外省戏班外，还有不少不必参加会馆的官班。

在来粤外江班异常活跃的时候，广州也出现了在本地组织的外江班。乾隆三十一年立的碑记有“洋行班”的名字，洋行班是广州十三洋行的商帮共同出钱组织的唱昆曲